



收入分配公平：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保障

□ 李子联

公平的收入分配之所以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保障作用，是因为收入分配通过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产生了较深层次的影响，而这两个结构层面所涵盖的中间要素恰恰对应着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评判体系。

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够有效地扩大内部需求

从消费需求来看，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形下，由于低收入群体占社会总人口的绝大部分，因此其有限购买力所带来的消费低迷，将导致内部工业品的需求不足，而这则制约了工业化的进程，既不利于经济数量上的增长，更不利于经济质量上的提升。相反，一种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有效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这对于其消费需求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不过，分配公平和收入提高对消费的影响，只有在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提高而递减时，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转移才能带来总消费的提高。对于我国而言，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总体而言均存在递减的趋势，而提高收入增长率则能够增加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了我国消费需求的不足，而收入分配的改善和收入差距的缩小则能够有效地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因而能够有效地

扩大消费需求，改善需求结构失衡的局面。

从投资需求的角度看，初始禀赋和收入来源是影响投资的主要因素。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形下，高收入群体拥有较高的初始禀赋及更多的收入来源，因此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具有较高的投资水平；相反，低收入群体则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不论是初始禀赋还是收入来源均较为有限，因此其投资机会受到了较大的限制。从两者比较来看，由于低收入群体在社会总人口中占有较大比重，因此收入差距扩大对投资所带来的累计影响始终是负的。此外，收入差距越大，社会治安稳定性越差，相应地，生产投资的社会环境也就会随之恶化，致使社会总投资额下降。一种更加注重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不仅能够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加其从事投资的初始禀赋，还能够有效缓解社会矛盾从而营造更为良好的投资环境。

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够有效地提升贸易质量

一般来说，收入差距会对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抑制作用。这使得一国所出口的产品具有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双低”的特征，明显不利于对外贸易质量的提高。对于中国而言，收入差距通过劳动和资本要素对贸易质量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从劳动要素的角度看，收入差距所带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出口产品的生产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从而促进了劳动密集型

产品的出口，带来了贸易数量的增长；从资本要素的角度看，收入差距通过资本积累对贸易增长产生的影响具有“结构效应”。也就是说，所带来的物质资本积累有力地促进了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但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减少则不利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可见，中国的收入分配通过劳动要素、物质资本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促发了贸易模式的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有利于贸易质量的提升。

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利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收入分配通过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对自主创新产生了不同的经济效应。从规模来看，需求对创新活动的方向与数量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当市场中存在足够的有效需求时，企业的创新投入才能通过市场最终转化为创新活动的收益，从而从根本上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从结构来看，收入分配是决定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同将形成不同的产品消费结构，从而为创新型产品带来了特定需求。就中国而言，适度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创新水平的提高，但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则将对创新能力的提升带来抑制作用。这是因为：从规模来看，收入差距提高了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后者所引致的对创新产品的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则激发了企业的创新动力；从结构来看，收入差距抑制了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使得低收入群体对创新产品难以形成有效需求，市场规模的

缩小则降低了自主创新水平。因此，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有效扩大消费规模的数量和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并因此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在城乡融合的初期，收入差距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动力。但是，收入差距的这一推动作用仅限于城乡融合的初期，从长远来看，收入差距并未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更为优化的配置。这是因为：收入差距扩大情形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目的在于获得高于农业生产的工资性收入，一旦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缩小，大量的转移劳动力便将从城市向农村或城镇“回流”。因为后者虽然获得了相对较低的收入，但却更容易使其在“故土”中得到归属感和认同感。这一现象极为普遍地存在于“农民工”转移大省河南、湖南和江西等地区中。从经济效率率来看，这一“回流”不仅未带来劳动要素更为优化的配置，反而带来了效率的漏损，且漏损值相当于从归属感和认同感中所获得的主观效用。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平等。由于不平等的存在，转移农民在城市难以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劳动报酬，因此，一种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够有效地留住自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并带来劳动要素更为优化的配置。



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

在收入差距扩大情形下，高收入群体拥有较为充裕的初始禀赋，因而具有较高的储蓄率，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程度都相对较高；但是，低收入群体的储蓄率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程度则相对较低。综合来看，收入差距不利于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这是因为，收入差距扩大情形下储蓄率的提高，是以牺牲大部分低收入人群的必要消费和必要的人力资本积累为前提的，因为本应配置于教育支出和培训支出中的社会财富却被配置在了高收入人群的物质资本积累中；不仅如此，相对于低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的数量规模相对较小，其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程度的提高也较为有限。因此，一种资产收入由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的再分配及其力度的加大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总量和平均生产率。从这一层面来看，缩小收入差距的公平分配制度，能够有效促进社会人力资本

积累程度的提高，因而带来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综合而言，收入差距从需求结构的角度导致了我国内需的不足，而收入分配改革能够提高消费需求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而使经济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经济增长质量得到提升。从供给结构的角度看，收入差距及其扩大在提高物质资本积累的同时，也降低了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能力，使得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社会经济只能依靠要素投入而不是创新驱动的模式进行发展，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及其深化则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并使经济增长的效率得到有效提高。经济增长方式能够实现由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同时还能有效提高自主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此，一种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对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发展论坛

新常态是新主线的逻辑起点

□ 顾利民

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从新常态和新主线的内在联系分析，新常态是新主线的逻辑起点。

对新常态下增长速度规律的战略把握为从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条件。新常态所呈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化，这是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经济阶段后的必然现象，也是中国经济在各种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必然现象，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我们必须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从国外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采取超常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把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重心和手段主要放在需求侧，企求通过大规模发放货币、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等一系列宽松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刺激经济，但多数发达经济体依然增长乏力，仍未摆脱金融危机的泥沼，有的在债务危机中越陷越深。从国内看，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尚没有过去，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期，我们实施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对应危机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由于刺激的边际效应逐步递减和弱化，需求侧刺激带来了投资效益下降、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严重、杠杆率提升、房地产等领域存在的经济金融风险提高、“脱实向虚”有所显现、生态环境压力加大等问题。这些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所以解决问题的路径不可能主要依靠需求侧的调控，而必须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经济工作思路就必须从注重短期经济增长和数量增长向注重

可持续发展和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为中心转化，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我国经济运行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轨道上。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结构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新常态所呈现的经济结构从低度化、不合理化向高度化、合理化转化，需要需求侧的政策激励，但根本和起主导作用的是充分激发供给侧的人才、资本、土地、技术、制度等的创造性和活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新常态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环境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更多更明显地体现在生产的质量、生产的结构上。从总体上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生存资料的需要，对于享受资料、发展资料的需求与日俱增；已经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生活消费，而对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与日俱增；已经不能满足于物质消费，而对教育、环保、信息、健康、体验、旅游、时尚等的消费与日俱增；已经不能满足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而对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品质化消费与日俱增。而供给侧不能适应这种需求的变化。不能适应的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粗放型，在于产业和产品的转型升级缓慢，在于生产和供给不能有效地从中低端推向中高端，在于较长时间中过分地注重数量和速度而忽视了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致使供需错位；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影响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影响人们的获得感。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供需错配问题，需要通过调整存量、做优增量两方面的深度调整来实现。而调整存量的实现形式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做优增量的实现形式就是降

成本、补短板，从而去掉低利润、高污染的过剩产能，激发新的经济动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平衡供需关系，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渐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更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

新常态下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化过程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的过程。新常态所呈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主要依靠低劳动力价格和生产要素投入向创新转化，也必然要求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现在，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基本消失，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尤其是处于16到60岁的劳动人口每年以三四百万的速度在减少，劳动力价格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已是远高于东南亚一些国家。劳动力报酬的提升本是好事，但如果不是建立在企业利润提升基础上而是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导致，就会造成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且随着经济扩张，资源和环境越来越成为刚性约束。“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也迫切要求转变发展方式。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供给侧的第一动力。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是供给侧改革的两个支柱。只有技术创新才能提升我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强大的经济基础。只有制度创新才能增强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而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充满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经济时评

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发展新格局。二是树立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样板。雄安新区承上启下、接东联西，在新型城镇化和统筹城乡发展方面独具优势。注重将新区建设和培育特色小镇、建设美丽乡村相结合，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树立统筹城乡发展典范和标杆。

建设绿色宜居生态之城。拥有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白洋淀是雄安新区独特的资源禀赋条件，也是未来建设发展的重要依托。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恪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划定开发边界和生态红线，严格区域环境保护，加大植树造林和湿地恢复力度，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绿色宜居生态新城。

建设开放引领活力之城。建设开放发展先行区是雄安新区重要目标定位之一，而且是比肩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的开放型经济形态，是拥有更大空间、更新活力、更优质素的全方位开放态势，将在提升京津冀对外开放整体水平上发挥重大引领作用、作出更大贡献。一是量身制取灵活合体的对外开放新政策。二是打造富有活力竞争力的对外开放新高地。雄安新区地处冀中腹地，与京津成鼎足之势，临近天津滨海新区、沧州渤海新区，辐射冀中南广阔区域，对外开放区位优势凸显。新区要主动服务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利用京津冀三地对外开放基础和雄安新区自然环境优势，构筑对外交流平台。

建设共享发展幸福之城。实现共享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应有之义，规划建设雄安新区为实现这一目标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新区建设将紧紧围绕“人”这个核心谋篇布局，充分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发展社会事业，配套优质教育医疗等资源，使雄安新区率先成为共享协同发展成果的幸福之城。一是使共享发展理念融入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全过程。要使共享发展理念内化为新区规划建设的共识共举，从科技创新到对外开放，从智慧城市到森林城市，每一个领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 张春雷

域、每一个环节、每一处细节，都要在精细处用功、在精准上发力、在精微中见精神。二是把共享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前提，雄安新区公共服务体系和能力建设从一开始就要坚持高标准、高水平。要将协同发展重点领域由交通、生态和产业向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领域延伸。